



明代文学与 科举文化生态

Th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Ecolog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陈文新 主撰

高等教育出版社

1206.2

59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明代文学与 科举文化生态

《CIP》目録照录书号

Th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Ecolog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陈文新 主撰

定价 31.00元
ISBN 978-7-04-041810-2

http://www.hep.com.cn
http://www.hep.com.cn
http://www.hepmail.com.cn
http://www.hepmail.com.cn
http://www.hepmail.com.cn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0012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787mm×1092mm 1/16
18.25
310千字
010-28840081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 / 陈文新主撰.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04-044840-5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
研究—明代②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I206.2
②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8676号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

Mingdai Wenxue yu Keju Wenhua Shengtai

策划编辑 孙璐 责任编辑 孙璐 张岩 封面设计 王洋
版式设计 王洋 责任校对 刘春萍 责任印制 耿轩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市大天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1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4840-0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	6
第一节 明代馆阁文人的文学活动与身份意识	6
一、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	6
二、明代馆阁文人的写作生涯	10
三、明代馆阁文人的身份意识与“富贵福泽之气”	15
四、明代馆阁文学活动之意义	21
第二节 明代会元别集所见“馆阁写作”	26
一、明代会元的任职情形	27
二、明代会元的馆课与讲章	30
第三节 明代会元别集所见馆阁文学	36
一、会元别集所见明前期馆阁文学	37
二、会元别集所见明中后期馆阁文学	48
第二章 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	58
第一节 明初文化格局中的地方儒学与台阁文风	58
一、明初地方儒学官的地位与台阁要员的教官经历	59
二、儒学官员与台阁群体的互动促成了台阁文风的盛行	62
三、台阁文风是明初新的文化格局形成的重要标志	65
第二节 明代南北取士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	69
一、南北人文差异及其对明代文学的影响	70
二、明代前期南北取士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	73
三、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消沉及其影响	79
第三节 嘉靖七子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	82
一、嘉靖七子的同年之谊及其与唐宋派之间的代沟	83
二、唐顺之、王慎中的科举背景及其特殊的台阁意识	85
三、嘉靖七子的郎署意识及其对严嵩的抗争	88

四、科举背景与嘉靖七子内部的盟主之争	94
第三章 明代状元与明代文学	98
第一节 从状元选拔及其仕途看文学在明代科举中的地位	98
一、明代科举考试对“文藻”的关注和规范	99
二、明代状元的仕途与文学之关系	104
第二节 从状元文风看明代台阁体的兴衰演变	109
一、明前期状元文风与台阁体的兴盛	109
二、弘治状元康海的转向与台阁体的衰微	114
三、万历状元焦竑的民间情结与台阁体的末路	119
第三节 明代状元别集文体分布情形考论	125
一、明代状元别集存佚考	126
二、明代状元别集中的文体分布情形	128
三、“最重要”的文体和“最不重要”的文体	130
四、文学史视野下的明代状元文学	135
第四章 明代的科举文体与明代社会	138
第一节 明代殿试策论与明代的社会问题及决策导向	138
一、明代殿试策问与明代社会问题的密切关联	139
二、明代殿试策论与明代的民生问题	143
三、明代殿试策论与明代的民风问题	147
四、明代殿试策论与明代的吏治问题	150
五、明代殿试策论与明代的军事问题	154
第二节 明代八股文深受明代思想文化进程影响	158
一、洪武至弘治年间谨守程朱传注	159
二、正嘉以降心学逐渐渗入八股	165
三、隆万以降道释杂入制义	170
第三节 拓展和丰富儒家传统是明代八股文的重要价值	177
一、明代八股文丰富了明代思想文化	177
二、1905年以来明代八股文研究之得失	186
第五章 政治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科场案	195
第一节 科场案与明代政治	195
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与地域均衡	195
二、贵胄不可以先寒峻：明中期辅臣子弟科第案	199
三、党同伐异：明末科场关节案	205

第二节 明代科场案与明代作家的文学生涯	
——以唐寅、王衡为例	208
一、科场案与唐寅的文学生涯	208
二、科场案与王衡的文学生涯	215
结语	222
参考文献	224
索引	257
人名索引	257
术语索引 (含书名索引)	269
后记	280

1979年以前是研究的沉寂期,以为定论的新值评判为主;1979年至90年代研究的逐渐兴盛期,“同情之了解”成为主流,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之所以以1995年为起点,是因为科举制度在这一年被正式废止。

1951年,钱穆在《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一文中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应当客观评价作为一种考试文体的八股文,指责八股文迫害文人的罪状是过于偏激的,他还强调,科举制度是一项对社会、对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制度,虽然它有很多缺点,但清末时对其连根拔去也造成了“种种恶果”“祸及人祸”。钱穆所说的“过于偏激”,不幸成了1949年至1979年间的主题。“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只是一堆陈年历史垃圾,即使要去毁灭,主要也是为了肃清其流毒。”^①在民国后期开始热闹起来的相关研究,这一时期基本中断,对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做研究的,只有极少的几本著作和几篇论文,其中绝大部分著述,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集中在对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的“反批判”上。作家刘绍棠曾说:“在我的印象里,八股文是和鸦片、鸦片烟枪归于一类的,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但是,若问起八股文究竟何物,却不甚了然。”^②不了解八股文而又对之深恶痛绝,成为一种状态正与各路媒体反复批判并不断提高批判语调所造成的。虽然钱穆逝世,却又是1949年至1979年间的常态。

1979年以来,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研究逐渐走向兴盛和繁荣。刘绍棠提出了“科举学”和“科举文学”两个概念,2005年,他在《科举学导论》的第十章“科举文学论”中,介绍了科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几个精

① 钱穆,《中国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271-280页。

② 刘绍棠,《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文学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卷4页。

③ 刘绍棠,《刘绍棠文集》卷首刘绍棠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7页。

④ 刘绍棠,《刘绍棠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引言

1905年以来关于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的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05年至1949年是该研究的初兴期，研究成果较为零散，不成规模；1949年至1979年是该研究的沉寂期，以否定性的价值评判为主；1979年至今是该研究的逐渐兴盛期，“同情之了解”成为主流，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之所以以1905年为起点，是因为科举制度在这一年被正式废止。

1951年，钱穆在《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一文中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应该客观评价作为一种考试文体的八股文，指责八股文迫害文人的罪名是过于偏激的。他还强调，科举制度是一项对社会、对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制度，虽然它有很多缺点，但清末时对其连根拔去也造成了“种种病象”，“铸成大错”^①。钱穆所说的“过于偏激”，不幸成了1949年至1979年间的主调。“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只是一堆陈年历史垃圾，即使要去拨弄，主要也是为了肃清其流毒。”^②在民国后期开始热闹起来的相关研究，这一时期基本中断。对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做探讨的，只有极少的几本著作和几篇论文，其中绝大部分著述，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集中在对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的严厉批判上。作家刘绍棠曾说：“在我的印象里，八股文是和缠足、辫子、鸦片烟枪归于一类的，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但是，若问我八股文究竟何物，却不甚了然。”^③不了解八股文而又对之深恶痛绝，这样一种状态正是各路媒体反复批判并不断提高批判语调所造成的，虽然极不正常，却又是1949年至1979年间的常态。

1979年以来，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研究逐渐走向兴盛和繁荣。刘海峰提出了“科举学”和“科举文学”两个概念。2005年，他在《科举学导论》^④的第十章“科举文学论”中，介绍了科举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几个热

①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73～297页。

② 刘海峰：《二十世纪科举学论文选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4页。

③ 王凯符：《八股文概说》卷首刘绍棠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页。

④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点问题。他还先后发表了《科举文学与“科举学”》《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等数篇论文，其核心理念是：“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①

黄强的《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②是一部论述八股文对明清文学影响的专著^③，2005年正式出版。作者分类讨论了八股文与明清戏曲、小说、诗文的关系，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拿戏曲、小说与八股类比，抬高了戏曲、小说的地位；批判八股文是明清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的主张深刻影响了明清散文理论。黄强还反驳了前人“八股文盛而诗衰”的说法。郭皓政的《明代状元与文学》^④是已经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个案考察的基础上，试图从总体上把握明代状元文学的发展趋势。郑礼炬的《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叶晔的《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2011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同年出版的著作不约而同地探讨了明代科举制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意识形态契合与交叉。李子广的《科举文学论》^⑤出版于2012年，其主旨是在科举文化的大背景下，以时代为线索，对科举与文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密切关联做具体探究。

明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研究视野下的文献整理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陈文新主编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凡22种27卷，约2700万字，其中数种涉及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研究，如《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⑥《钦定四书文校注》^⑦《八股文总论八种》^⑧《游戏八股文集成》^⑨，

-
- ① 刘海峰：《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 ② 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③ 这部著作也可视为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集成，作者曾先后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八股文与明清戏曲》《明清“西厢热”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批判与攀比——明清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一瞥》等论文。
- ④ 郭皓政：《明代状元与文学》，济南，齐鲁书社，2010。
- ⑤ 李子广：《科举文学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⑥ 陈文新、何坤翁、赵伯陶主撰：《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⑦ [清]方苞编，王同舟、李澜校注：《钦定四书文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⑧ 张思齐整理：《八股文总论八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⑨ 黄强、王颖：《游戏八股文集成》，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以浩瀚的史料”凸显了“科举和文学的联系”^①。该丛刊第一辑 2009 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辑拟于 2016 年出版。

除了研究专著和文学史著作外，还有数篇论文从总体上涉及了明代文学与明代科举关系研究。其中高明扬《文体学视野下的科举八股文研究》^②、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③、王建《试论以选文为中心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④等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明代文学与科举之关系。关于科举文化影响明代诸文体的论述多见于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也有为数不多的专著对明代科举与小说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如 2009 年出版的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⑤、胡海义的博士学位论文《科举文化与明清小说研究》^⑥、王玉超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科举与小说》^⑦等。

从上面的缕述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研究已渐入佳境，成果颇丰。但毋庸讳言，这些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即研究中较少着眼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对明代文学的复杂而多元的影响，往往过多关注直线的因果联系，有时不免把问题简单化，或者忽略了一些不该忽略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厘清作家生活环境、作品创作年代以及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关注科举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经学素养、文章素养及其职业取向，关注科举考试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层级、人际关系以及这种社会层级、人际关系对作者文学活动的影响，关注中试者与落榜者的不同境遇以及这种境遇对不同个体文学生涯的影响，关注科举体制下作家的经济状况、物质生活条件对其文学活动的影响，无疑可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发现。

比如科举功名与作家的文体选择，二者之间的联系就耐人寻味。大体说来，明代的戏曲作者，尤其是重要的戏曲家，通常拥有进士、举人等科名，而话本小说的作者或编著者中，却少有举人、进士。如杂剧《中山狼》作者康海，是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殿试状元；传奇《宝剑记》

① 汤克勤：《科举研究史上的重大贡献——读陈文新主编〈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社会科学论坛》2010 年第 6 期。

② 高明扬：《文体学视野下的科举八股文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③ 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04 年第 1 期。

④ 王建：《试论以选文为中心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⑤ 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⑥ 胡海义：《科举文化与明清小说研究》，暨南大学，2009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⑦ 王玉超：《明清科举与小说》，扬州大学，2010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作者李开先，是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进士；传奇《红蕖记》作者沈璟，是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进士；传奇《修文记》《彩毫记》和《昙花记》作者屠隆，是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进士；传奇《郁轮袍》作者王衡，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榜眼；传奇《燕子笺》作者阮大铖，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进士；传奇《绿牡丹》《疗妒羹》作者吴炳，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进士。相形之下，明代最负盛名的话本小说代表作是“三言”“二拍”，前者的编撰者是冯梦龙，后者的著者是凌濛初，二人都只是生员，俗称秀才。话本小说和戏曲这两种文体，一向被视为俗文学中的姊妹文体，何以其作者身份有如此显著的差异？

答案其实就存在于戏曲与话本小说两种文体的不同消费方式之中。明代戏曲创作尽管有案头化的趋向，但仍主要是一种舞台艺术。与话本小说相比，其消费成本要高出许多，原因在于，话本小说只需要有文本可读就行了，而戏曲则必须搬演到舞台上，才能进入消费过程（少数典型的案头剧除外）。明代的诸多戏曲名家，如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皆蓄有家班，李开先的剧作通常由其家班演出，原因在此。尚无雄厚的经费支持，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的戏曲创作是难以持续的。那么，他们的经费来自何处？科举时代，文人之间的交游主要以“科举”或“宦游”为平台，科场得意不仅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提升，也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增加。明人因科场同年等纽带而在经济上获得资助，这类情形不时见诸记载，表明并非偶然。由此可见，那些科场得意者，一旦宦途失意，不仅有精力投身于戏曲创作，也有经济实力提供支撑；而那些科场失意之人，即使有创作戏曲的热情，也没有排演的实力。对于这种影响了作家文体选择的科举文化生态，以往的研究未予关注，不免造成了若干阐释盲区。

讨论科举功名与作家文体选择之间的联系，当然属于举例性质，而目的是探讨明代文学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之间的联系，这一题目的内容远比已经注意到的要丰富得多；《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的写作，就是为了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探索，为推进学术聊尽绵薄之力。本书的内容包括五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支持的部分：其一，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侧重考察明代文学侍从的生存样态及其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职能、馆阁文人的职业写作与非职业写作等；其二，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侧重考察明初文化格局中的地方儒学与台阁文风、明代南北取士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嘉靖七子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其三，明代状元与明代文学，侧重考察文学对状元选拔及其仕途的功用，状元文风折射出的明代台阁体兴衰演变的历程，明代状元别集的文体分布情

形及其文学史意义；其四，明代的科举文体与明代社会，侧重考察明代殿试策论所关联的明代社会问题及决策导向、明代八股文所关联的明代思想文化进程；其五，政治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科场案，侧重考察明代科场案如何受明代政治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明代政治，明代科场案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明代作家的文学生涯。这五个部分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即突出与集部相关的内容。之所以如此，不仅是为了呼应近年来兴起的杂文学研究，也是为了显示传统集部与科举文化生态的密切关联，弥补明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这些成果凝聚了我们多年的研究心得，期待学界同仁惠予关注，不吝赐教。

第一章 明代馆阁文人的 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

明代的馆阁文人，他们或长期生活在帝王身边，或某一阶段生活在帝王身边，其写作生涯不可避免地曾与朝廷大政相伴随，与此相关，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文学事业，也就与其他阶层的文人有较大区别。本章选取了三个侧面加以讨论：一是明代馆阁文人的文学活动与身份意识，侧重考察明代文学侍从的生存样态及其身份意识在文学活动中的呈现；二是明代会元别集所见“馆阁写作”，所谓“馆阁写作”，指明代馆阁文人职务范围内的写作；三是明代会元别集所见馆阁文学，所谓“馆阁文学”，指他们职务写作之外的诗、古文一类作品。第一节带有总论性质，第二节以明代会元别集为例具体考察馆阁文人的职务写作，第三节以明代会元别集为例具体考察馆阁文人的非职务写作。总体概括与具体分析结合，旨在相互呼应，相互补充，以期获得对明代馆阁文人较为完整的了解。

第一节 明代馆阁文人的文学活动与身份意识

在明代科举鼎盛的背景之下，馆阁文人的整体生存样态、写作生涯具有怎样的特质？其身份意识如何影响其具体写作？其文学活动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较为复杂，只有深入当时科举与文学互动的具体历史情景，悉心考察相关文献资料，才有可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找到较为切题的答案。

一、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

明代馆阁文人，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从科举背景下明代馆阁文人的主要来源与职业取向这两个层面入手，对明代馆阁文人的整体生存样态加以考察，也许可以获得较为清晰的印象。

提及明代馆阁文人，很难绕开杨士奇这个名字。杨士奇（1365—

1444)名寓,以字行,号谷轩,江西泰和人,与杨荣、杨溥合称“三杨”。建文元年(1399)正月以布衣征召入朝,授教授,旋入翰林充编纂官。试吏部,授吴府审理副,仍供馆职;永乐元年(1403)入值文渊阁,历侍读、左中允、左谕德学士。改左春坊大学士,仍兼翰林学士。明仁宗继位后,士奇以东宫旧臣擢任华盖殿大学士,进少傅,兼兵部尚书。正统初,进少师。卒,赠太师,谥文贞。有《东里集》。士奇历仕四十六载,在仁宗、宣宗两朝和英宗初年,担任首辅长达三十年之久。由一介布衣跃升为馆阁文人,最终入阁主政、位极人臣,堪称明代馆阁文人之最。关于他成为馆阁文人之前的经历,《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做了如下梳理:明太祖洪武十年丁巳(1377)之“杨士奇始从陈谟习举子业”条,引《太师杨文贞公年谱》载录他十三岁习举子业的情况;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己未(1379)之“杨士奇出教里塾”条,引《太师杨文贞公年谱》、《东里续集》卷十七《史略释文》等记述他十五岁因家贫而弃学、出教里塾,为村落“童子师”的情况;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庚申(1380)之“杨士奇馆于山东”条,引《东里续集》载述他在山东“坐馆”的情况。由《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列上述三条可知:与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杨士奇曾接受较为系统的科举教育,即所谓“习举子业”;他早年谋生的主要手段也是从事科举教育,即“为童子师”“坐馆”。杨士奇由一介布衣跃升为“馆阁文人”的过程,在《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中也有迹可循: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八月”之“征江西处士杨士奇”条、明惠帝建文元年己卯(1399)“正月”之“修《太祖实录》”条,记载其“以布衣被荐,征为教授”^①,又授翰林一职的情形;明惠帝建文二年庚辰(1400)“三月”之“纂修官齐府审理副杨士奇为翰林院侍讲”条、明惠帝建文四年壬午(1402)“七月”之“翰林院人事变动”条,载述他擢升编修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杨士奇由“处士”直接征聘为官,并进而担任翰林编修之类具有“馆阁文人”性质的职务,这种经历在明代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一如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四十九《科举考序》所云:

洪武三年取畿内诸贡士,寻未及会试而官之。明年始复试,得进士吴伯宗等。以为诸儒生多未脱咕啐,无益天下大计,罢之。又

^① 陈文新、何坤翁、赵伯陶主撰:《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197页。《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学术成果,旨在用丰富的史料展示科举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这一节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故多所参考。特此说明,敬请读者谅解。

十三年，而始更布条式，载在甲令。二百年来，公卿大夫之业皆出于此，易代之际灼然名臣至孤卿者，当有杨士奇之担簦，刘中敷、杨善之版筑，夏原吉、郭进、胡俨、吴中、吕震之应乡书，而其后遂寥寥矣。^①

确实，“二百年来，公卿大夫之业皆出于此”，不论是馆阁文人还是其他高官显宦，通常由进士起家，也就是明人所习称的“正途”。作为明代馆阁文人中的一员，杨士奇的晋升之途是明朝前期才有的一个特例，但仍以接受过系统科举教育为前提，如果没有儒生身份，他就不可能获得遴选资格。换言之，即使作为一个特例，杨士奇的学历及晋升途径仍旧不能缺少系统的科举教育这一环节。此后，当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的定制得以确立，拥有进士科名便成为明代馆阁文人的必备条件了。嘉靖前期的馆阁文人廖道南，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个案。

廖道南（1494—1547），字鸣吾，号洞野，湖广蒲圻人。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至翰林侍讲学士。道南于世宗朝前期颇蒙优眷，但终其一生主要担任翰林馆职。而翰林院，又恰是明代馆阁文人栖身的主要官署。关于廖道南的科名情形，《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有如下记述：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五月”之“补庚辰廷试，赐杨维聪、陆钺、费懋中等三百三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改廖道南、江汝璧等二十四人为翰林院庶吉士”条，述其以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进士及第并被选为庶吉士。明世宗嘉靖元年壬午（1522）“十一月”之“翰林院庶吉士廖道南、江如璧、童承叙、黄佐、王相、王同祖为编修”条、明世宗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正月”之“右中允廖道南，右赞善蔡昂并为翰林侍读学士”条，则记录其出任翰林编修、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的情形。大体而言，似廖道南这样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进士科名并选为庶吉士者，才是明代馆阁文人的主要来源。有明一代可确指为“馆阁文人”或曾一度扮演“馆阁文人”角色者大多出身进士，如曾任翰林编修、翰林学士等职的杨溥，是建文二年庚辰（1400）二甲进士；曾任翰林编修的杨荣，是建文二年庚辰（1400）进士（二甲第三名）；号称“青词宰相”的严嵩，则是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二甲进士（二甲第二名）、翰林院庶吉士。在科举鼎盛的时代背景下，科场得意、中进士第甚至取得较高名次、被选为庶吉士者，才有望进入“玉堂清署”；

①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四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第646页。

唯有担任这类职务，才有望成为馆阁文人，也就是明人所谓“简儒臣充文学侍从之官”^①。在科举考试成为明代大多数读书人别无选择的进身之阶以后，如西汉司马相如那般仅凭文学才能而被皇帝直接遴选为文学侍从的情况十分罕见；即使像文徵明这样大名鼎鼎、成就有目共睹的人，因系以岁贡生荐送吏部，也只能屈居“翰林院待诏”等较低职位，鲜有人侍君侧的机会，无从置身严格意义上的馆阁文人行列。

明代馆阁文人中，既有廖道南这样“止于官僚”、终身主要以文学侍从为职的人物，也不乏杨士奇这类由翰林而入主内阁的人物，如夏言、严嵩等人莫不如是。杨士奇的仕宦经历，提供了一个由单纯意义上的馆阁文人顺利转型为朝政主持者的典型案例。对于这一过程，《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亦做了梳理：明惠帝建文四年壬午（1402）“八月”之“命解缙（1369—1415）、黄淮（1367—1449）、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1368—1431）、胡俨等七人同入内阁，预机务”条、明成祖永乐元年癸未（1403）“八月”之“解缙、黄淮、胡广等入直文渊阁，预机务”条，载述杨士奇由翰林馆职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务等情形，这意味着他实现了由文学侍从之臣到朝政主持之臣的华丽转身。此时，其身份已不是单纯的馆阁文人。由单纯的馆阁文人最终入阁主政，杨士奇的仕宦之路正是馆阁文人群体相当普遍的理想与追求。换言之，许多明代读书人理想中的仕途，固然是从馆阁文人起家，却通常不愿就此止步，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台阁重臣。

明代馆阁文人的这种职业取向，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对这一情形，可以从培养机制、选拔机制及升迁机制等三方面加以考量。就培养机制而言，明代馆阁文人接受的是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主的科举教育。科举教育不是以培养专业的文学人才为目的，而是以培养各个层级的文官为旨归。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就是为了满足文官选拔的这些基本要求。就选拔机制而言，随着科举制度成为明代占绝对主体地位的选官制度，馆阁文人的选拔路径与台阁重臣的选拔路径基本并轨。既然科举考试以选拔各级行政官员为主要目的，又以“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观士子经世之学”的“策论”等为主要考试文体，这就决定了明代馆阁文人的选拔机制并非单纯以辞章一较短长。就升迁机制而言，

① [明]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8册，第661页。

明代自英宗朝后，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①的定制，明代馆阁文人的重要来源——“庶吉士”，更有“储相”之誉。这种受科举考试名次影响的升迁机制，使明代馆阁文人转型为首辅阁臣成为一条有现实可能的升迁路径，也成为当时馆阁文人共同的职业取向。而且，不只馆阁文人本人的职业期许如是，皇帝陛下对于这些“天子门生”的职业期许，也往往并不满足于“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层面；同时不少明代人确信，来自于翰林院的内阁首辅，其素养总体上较其他阶层更高一些。朝廷和社会都认可馆阁文人的这一职业取向，并为这种职业取向的实施创造条件，馆阁文人做这样的人生规划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可以说，一个馆阁文人如不这样规划人生，反倒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二、明代馆阁文人的写作生涯

侍奉君侧并主要以文学侍从为皇帝服务的馆阁文人，其写作生涯如何展开？对这一问题，拟分“典型馆阁写作”与“非典型馆阁写作”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所谓“典型馆阁写作”，指无论在哪个朝代，只要有类似馆阁文人群体或个体存在的境况下都会发生的写作活动。这类馆阁写作活动与馆阁文人身为皇家文学侍从这一职业定位直接相关，是其日常职责中必须完成的内容。其中尤为典型的，如应制、唱和、献诗献颂等。表 1-1 与表 1-2 仍引《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涉史料为例，前者以明宣宗一朝之馆阁写作活动为时段截面，后者以廖道南一生之馆阁写作活动为文人个案，致力于展示明代馆阁写作活动的一些具体细节：

表 1-1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见宣宗朝馆阁写作活动

时间	馆阁写作情况	所见条目	征引文献
宣宗宣德四年（1429）	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蒙宣宗赐鲋鱼醇酒及御制诗，有“乐有嘉鱼”之句；士奇等沾醉献和章	“宣宗特赐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鲋鱼醇酒”条	《馆阁漫录》卷二
四年	南京守臣襄城伯李隆献驹虞，夏原吉因之献颂	“夏原吉献颂鸣瑞”条	《忠靖集》卷一《瑞应驹虞》序
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当日早朝，夏原吉应制赋诗二首	“夏原吉应制赋诗”条	《忠靖集》卷五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702页。